

【历史研究】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与农村公共食堂的存废

张海燕

摘要: 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考量,毛泽东于1961年专门就农村公共食堂的存废等问题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他不仅倡导全党上下一起动手调查研究,而且非常注重调查研究的组织实施。经过大量由“点”到“面”的调查研究,并在获取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他毅然做出解散农村公共食堂的决策。毛泽东对农村公共食堂存废问题的调查研究,不仅表明了他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积极态度,而且体现了他实事求是、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关键词: 毛泽东; 调查研究; 农村公共食堂存废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4)07-0139-05

农村公共食堂的兴办及其终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备受关注的的一个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从总体上看,纪实性的成果比较多,理论分析性的成果相对较少。尤其是对毛泽东为什么要调查农村公共食堂问题以及如何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来解决农村公共食堂问题,尚缺乏深入细致的专门研究。本文试图从调查研究的缘起、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及其影响等方面,对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与农村公共食堂的存废之间的关系做些分析探讨。

一、毛泽东调查研究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缘起

1961年,毛泽东以农业问题为开端,在各条战线上展开了大规模的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由于农村公共食堂问题是当时农村工作中最为突出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而成为毛泽东调查研究工作的重中之重。

1. 基于历史的惯性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是毛泽东解决问题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早在大革命时期,为应对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任,毛泽东到湖南湘潭、湘乡等五县进行了实地调查后,写出了著

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深入了解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实际状况,毛泽东多次进行调查研究,并撰写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调查报告。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分析并解决了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面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的挑战,毛泽东对调查研究这一卓有成效的工作方法依然情有独钟。

2. 基于对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经验教训的总结

1958年至1960年,由于农村工作和经济工作中的急于求成和盲目冒进,给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重大损失。在毛泽东看来,出现这种错误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不注重调查研究的结果。1961年初,出于对过去一段时期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毛泽东多次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1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尖锐地指出“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①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再次强调,过去几年的工作之所以

收稿日期: 2014-03-12

作者简介: 张海燕,男,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副教授,法学博士(湘潭 411105)。

出现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调查研究工作做得太少了,因而 1961 年要成为一个“调查研究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②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很快为全党所认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在随后的讲话、报告、文章和批示中,也都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作了相应的阐述。与此同时,《解放军报》辑录刊发了《毛泽东论调查研究》,各地报刊登载了大量有关调查研究的理论文章、宣传材料及一些有参考价值的调查报告,造成了强大的舆论和宣传声势,从而在全党上下掀起了调查研究的热潮。

3. 基于解决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现实需要

早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一些地方就开始试办起农村公共食堂。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作为“巩固人民公社的一个基本关键”的农村公共食堂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普及。在当时,办不办公共食堂已经上升到是否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人民日报》的社论甚至还提出“公共食堂万岁”之类的口号。农村公共食堂一度实行“吃饭不要钱”,并提倡“放开肚皮吃饭”。这种超出生产力发展水平、建立在绝对平均主义基础上、与政社合一的高度集中的体制联系在一起,其弊端很快暴露出来:一是集中定点定时吃饭,给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不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二是为解决农村公共食堂的柴火问题,大肆砍伐树木,甚至不惜拆除房子、木桥、水闸等基础设施,造成了物质资源的极大破坏和浪费;三是不允许群众养鸡、鸭、猪、羊等家禽家畜,导致群众很难吃到荤菜;四是农村公共食堂组织专人从事砍柴、煮饭、炒菜、担水等工作,导致劳动力的极大浪费;五是削弱和破坏了农民家庭固有的自救能力,以致在灾害面前变得更加脆弱和无助;六是农村公共食堂的一些领导者和管理者克扣群众口粮,供自己和家属搞特殊化,个别干部甚至以不给饭吃来打击报复不听他们话的群众,直接导致干群关系、党群关系紧张。对于“吃饭不要钱”的农村公共食堂,毛泽东曾经一度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认为办公共食堂是破除私有观念、强化集体观念、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并加速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一条新途径,甚至不顾党内的反对声音,在实践中强力推广。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公共食堂本身存在的问题及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越来越凸显。这不仅迅速引起毛泽东的

高度重视和关注,而且促使他试图通过调查研究来了解其真实的情况,解决其存在的问题。

二、毛泽东调查研究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范式

调查有直接调查和间接调查。所谓直接调查,就是通过走访、考察、蹲点等形式,深入工厂、农村等基层单位进行实地调查;所谓间接调查,就是通过会议、座谈等形式听取汇报以了解情况,或派遣身边的工作人员去基层调查后再听取他们的汇报。毛泽东主要是通过间接调查了解农村公共食堂的情况。

1. 指派身边工作人员组成调查组深入农村作“点”上的调查

为了解农村工作情况,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刚一结束就指派他的秘书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等牵头组成三个调查组,用 10 到 15 天时间分赴浙江、湖南、广东三省农村就公共食堂问题进行实地调研。当地省、地、县、公社党委的一些负责人也参加了调查组的工作。

由田家英带队的浙江调查组在嘉兴县和富阳县分别选取了一个公共食堂搞得最差和搞得最好的生产队进行对比研究。当时,由于粮食减产严重,浙江省的公共食堂大多难以为继。嘉兴县的和合生产队 1960 年的粮食平均亩产只有 291 斤,不到通常年景的一半。群众对中央“坚持食堂”的规定确实有不少怨言。^③调查组与当地干部群众同吃同住,促膝谈心,了解到大量的真实情况。如不少社员之所以不愿意在食堂吃饭,主要是因为食堂只煮饭不做菜,社员们将做好的饭带回家后往往还得热一次才能吃。田家英及时将调查到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如实汇报。^④浙江调查组的汇报使毛泽东对农村公共食堂如何适合群众问题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由胡乔木带队的湖南调查组关于公共食堂的调查汇报前后有一个变化过程。在调研初期,胡乔木主要抓的是公共食堂搞得比较好的生产队,在向毛泽东汇报时,他以长沙县的农村为例说明公共食堂不能解散,并认为在遇到灾难的时候,公共食堂还能起到很大的作用。^⑤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到湘潭县韶山大队调查以后,胡乔木真切感受到不少社员对公共食堂的确很不满意。当他再次向毛泽东汇报时,胡乔木谈到:韶山地区因为办公共食堂导致山林遭到严重破坏、劳动力浪费严重等诸多问题。许多群众尽管有要求解散食堂的愿望,大小队干部

也赞成停办食堂,但干部又不敢做主将食堂解散,主要的顾虑是怕犯右倾错误。当毛泽东问胡乔木食堂能不能立即解散时,胡乔木明确回答说,立即解散虽然有缺房等问题,但解散有利而且可以解散。除了口头汇报外,胡乔木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并附上了《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等四个附件。报告根据群众的反映,认为,大多数公共食堂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成为农村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因为它同工分值降低、社员收入减少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又在群众的每天生活中引起许多不便。”^⑥报告在列举公共食堂种种问题之后认为大多数食堂应当尽早解散。

派驻广东的调查组通过座谈会和实地考证,将广东新兴、南海、番禺等县农村所了解的情况以“调查纪要”和“座谈纪要”等形式向在广州的毛泽东作了汇报,其中吸收了新兴县里洞公社蒙坑大队党支部书记梁纪南对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和公共食堂问题的意见。1961年3月,在毛泽东主持的“三南会议”(指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大区)上,毛泽东谈到食堂问题时特意提到“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⑦

毛泽东指派的三个调查组将毛泽东的要求贯彻在调查研究的实践中,及时将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如实汇报,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这为毛泽东思考并调整农村公共食堂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2. 听取地方领导的汇报作“面”上的调查

除派出调查组,毛泽东还亲自到南方各省调查了解情况。一路上,他就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规模问题、分配问题和食堂问题等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其中,毛泽东关注较多的还是农村公共食堂问题。

在杭州到绍兴的专列上,毛泽东听取了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对农村公共食堂的汇报,并询问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对农村公共食堂的看法。在毛泽东的鼓励下,江渭清道出了农村公共食堂存在的几个问题:食堂耗粮特别大;办公共食堂,不许养鸡、养鸭、养猪、养羊,结果没有蛋吃,没有

肉吃;吃食堂浪费大得不得了。^⑧这虽然对毛泽东有一定的触动,但此时他思考的还是如何办好公共食堂的问题。在江西,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就江西省农村整风整社等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在听取汇报时,毛泽东针对食堂问题,提出办食堂要灵活多样,满足不同人的要求。在湖南听取汇报时,毛泽东特意询问了湖南办农村公共食堂的情况,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张平华作了完全肯定的回答,认为,湖南的食堂办得好,受社员欢迎。对办公共食堂持肯定意见的汇报,毛泽东不时提出自己的一些疑问,以求对公共食堂的情况有一个全面的认知。在广东,毛泽东征求了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他曾参加讨论和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对农村公共食堂的看法,在初步了解到湖北农村公共食堂的基本情况后,他再次强调办农村公共食堂一定要考虑群众的意愿,但同时他又明确表示:“办食堂这个制度是肯定了的。”^⑨

地方领导人的汇报使毛泽东对农村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为他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提供了重要参考。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农业六十条”虽然提出要对农村公共食堂存在的一些问题加以纠正,但未彻底放弃继续办公共食堂。“农业六十条”颁布以后,毛泽东非常关注群众对“农业六十条”的反应,并通过各种方式及时了解各地反映的情况。其中,湖南关于群众反应的汇报给毛泽东的触动最大。1961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停靠于长沙附近的专列上,听取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农村干部群众对“农业六十条”草案反应的汇报,张平华汇报时强调群众在讨论“农业六十条”时最关心、议论最多的是农村公共食堂问题和供给制问题。4月9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又听取了刚从农村调查回来的张平华的汇报。张平华在汇报时特别讲到,以前他对农村公共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总觉得不喜欢食堂的就是那些为数不多的富裕中农,事实上是多数人不喜欢食堂。毛泽东对此深有同感,并越来越感觉到农村公共食堂不得人心。^⑩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张平华等地方领导干部对农村公共食堂的认识在深化,毛泽东对农村公共食堂的认识也在深化。

3. 督促中共中央领导人作实地调查

农村公共食堂到底是继续办下去还是立马停

办,还需要在党的中央领导层达成共识。为达此目的,毛泽东多次催促中央领导人到农村去做调查。在毛泽东的督促下,1961年四五月份,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先后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写了许多调查报告,并通过写信、电报、电话等方式及时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反映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情绪和意见,提出解决农村问题和其他问题的方案、措施和办法。毛泽东及时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其他一些领导人的调查报告和通信并写了批语,供各地参考。

刘少奇在湖南长沙县的天华大队和宁乡县炭子冲大队做了44天的调查后向毛泽东作了口头汇报,明确表示农村公共食堂没有优越性,应当解散。5月7日,周恩来就其在河北邯郸农村所作的调查向毛泽东作了电话汇报。其中关于食堂问题,他说: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都愿意回家做饭,社员不赞成供给制,要求恢复农业高级社时的评工记分办法。毛泽东极为重视周恩来的意见,当即指示将电话记录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考。^①朱德前往四川、陕西、河南、河北四省重点调查农村公共食堂问题。回到北京后,他在5月9日致毛泽东的信中谈到:多数群众愿意回家自己做饭,少数群众愿意留在食堂吃饭,并列出了群众所说的农村公共食堂“五个不好”(即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力、浪费时间、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②邓小平和彭真领导的五个调查组在北京郊区作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5月10日,他们联名致信毛泽东,反映调查了解到的情况。他们认为,农村公共食堂的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要走群众路线,完全根据群众自愿。毛泽东对这封信很重视,并很快作出批示“此信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③

同一时期,中央还派出了大批调查组到各地农村进行调查,其中有杨尚昆领导的徐水、安国调查组,习仲勋领导的河南长葛调查组,胡耀邦领导的辽宁海城调查组等。这些调查组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详细汇报了当地农村的有关情况,系统提出了解散农村公共食堂、改变分配制度、调整社队规模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关于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调查汇报,不仅说明了农村公共食堂

确实存在许多问题,而且坚定了毛泽东解散农村公共食堂的决心。

三、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与农村公共食堂的终结

1961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针对农村公共食堂,该条例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对于参加和不参加的社员,生产队都应该同样看待,不能有任何的歧视”。这样的规定实际上等于允许公共食堂停办,从而使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用行政命令大办食堂的错误得以纠正。在被视为“共产主义要素”的农村公共食堂终结过程中,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为农村公共食堂的解散营造了比较宽松的、民主的氛围。在当时,继续举办还是解散农村公共食堂是与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对广大干部群众而言显然是一个思想禁区,因而即便农村公共食堂兴办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情况和问题,也不敢轻易发表意见。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对农村公共食堂的态度在全党起着重要的风向标作用。对于办农村公共食堂,毛泽东最初是十分看好并极力推崇的,但在公共食堂的问题暴露后,他并不护短,而是亲自领导调查小组调查公共食堂问题,与各级党员干部广泛交流意见,并在调查中认同一些地方解散公共食堂的试点。尤为重要的是,毛泽东还带头就农村公共食堂出现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他后来曾说,过去过分强调农村办公共食堂是不对的。并就1959年对不赞成办公共食堂的中国科学院昌黎调查组展开批判一事作了自我批评。^④毛泽东的这些言行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公共食堂问题并不是神圣不可触及的。这在当时无疑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营造了一个让广大党员干部敢于、勇于并善于表达自己真实想法的宽松氛围,为全党在彻底解决农村公共食堂这个政治意味浓厚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无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为农村公共食堂的解散提供了决策的科学依据。毛泽东强调“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

究。”^⑮可见要想科学决策,就必须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农村公共食堂存废问题上,尽管毛泽东主要是通过间接调查来了解情况,但他获得的绝大部分信息都比较客观真实,这为他后来作出解散公共食堂的决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的间接调查之所以有成效,一是与其重视调查研究工作的组织实施是分不开的。在毛泽东指派三个调查组时,对调查组的人数,怎么调查,做什么准备都作了详细的部署和安排,甚至连一些技术细节方面的问题也都给予了考虑。如提出调查组成员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个组要再细分成两个小组;调查时要“抓两头”等等。正是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和方法,三个调查组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具体的、生动的、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毛泽东除了直接领导调查小组调查研究外,还特别注重发挥和调动全党的智慧。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每年一定要有几次亲身进行的有系统的基层调查,并要形成制度。这在全党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使得调查研究在全党蔚然成风。二是与其重视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在选取调查对象时就强调既要有搞得最好的生产队,也要有搞得最差的生产队;在听取汇报时,既听取对办公共食堂持否定态度的意见,同时对肯定办公共食堂的意见总要从反面提出疑问;既注重高级干部的调查报告,又注重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既有政策制定之前及制定期间的调查研究,又有关于政策实施及其成效的调查研究。通过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不仅了解到农村公共食堂存在着浪费大、破坏山林、不利生产、绝对平均、影响党群关系等诸多问题,而且认识到农村公共食堂得不到大多数群众拥护和欢迎的主要原因。认为,既然农村公共食堂为大多数群众所不满,就完全有解散的必要。正是立足于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中共中央才及时作出了解散农村公共食堂的决策。

再次,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工作为农村公共食堂的解散及其善后提供了具体的政策指导。农村公共食堂问题不只是一个吃饭问题,而且是一个影响着农村方方面面的复杂问题。解决农村公共食堂问题

不能“一散了之”,需要作好解散及其善后工作。毛泽东通过调查认识到,解散农村公共食堂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但不能一蹴而就,要有条理有步骤的进行,因而特别提出要作好解散过程中的各项具体工作。如单身汉、困难户在农村公共食堂解散后的吃饭问题如何解决,一部分群众的住房及灶具问题如何解决等。针对这些具体问题,毛泽东作了调查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的见解,中共中央在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充分吸收了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成果。这主要体现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及其修正草案中,如修正草案中明确表示,对不参加食堂的群众给予切实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保障,对一些还需要食堂的群众如单身汉办合伙食堂的要求也给予满足,但明确规定“这些食堂,都要单独核算,同生产队的财务分开”,“生产队对于社员办的食堂,应该给予可能的支持和帮助,但是经济上不应该有特殊的待遇”。^⑯正是这些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有效解决了农村公共食堂问题,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和拥护,使农村公共食堂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正是因为毛泽东在1961年的调查研究,当时公社化运动中极为突出的农村公共食堂问题才得以解决。尽管这一调查研究是在毛泽东的强力推动下进行的,缺少必要的制度规范和保障,但它的客观效果表明,调查研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仍然是行之有效的法宝,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仍然是极其重要的决策方法,对密切党群关系、转变党的领导作风仍然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重要途径。

注释

- ①②④《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24、525—526、535页。③陶永祥《毛泽东与调查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24页。⑤⑦⑨⑩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31、1141、1137、1151—1152页。⑥⑰《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64、349页。⑧江渭清《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55—456页。⑪⑫⑬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58、959、959页。⑭孙克信等《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57页。⑮《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2页。

责任编辑:南武